

丘逢甲三事考辩

赫 兰 国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郑州 450053)

摘 要:丘逢甲的一生可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熠熠生辉。甲午战争前的丘逢甲是个忧国忧民、淡泊仕途、鄙弃功名利禄积极寻求富民强国道路的知识分子;甲午中日战争起,他散家资筹建义军,首倡自主,临危受命担任义军统领和民主国副总统,与强敌浴血苦战;内渡后,投身教育,为国育才,同情维新派进而转变成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可谓与时俱进。

关键词:丘逢甲;教育救国;台湾民主国;抗日保台;内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53—08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仲闾,别署沧海,世称“沧海先生”,台湾漳化人。我国近代台湾杰出的爱国诗人、教育家,台湾近代客家文学之祖。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首倡组建“台湾民主国”并任义军统领、副总统,积极抗日,事败归国从事教育救国。支持维新变法、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与民国的缔造,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

丘氏在近代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甲午、乙未保台期间,由于当时台湾孤悬海外,信息传递极其不易,更有投降分子的恶意中伤以及大陆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大,致使在当时对丘逢甲就有毁、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想之束缚,学界对丘逢甲的研究、认识一直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加之史料的缺乏和严重失实,致使到了今天,台湾尚有许多别有用心的利用丘逢甲的一些事迹为“台独”张目。大陆也有部分学者误解其建“台湾民主国”的用心,史学界对其评价依然是两种相对的观点。笔者仅就其一生中相对重要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丘逢甲中进士后弃官从教原因探究

1889年丘逢甲到北京参加会试。3月“先生于北京贡院参加会试……5月,揭榜,先生及第贡士(八十一名)。续参加殿试,胪唱赐同进士出身,为是科张建勋榜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一说是八十一名进士。查朱保炯、谢沛霖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出版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183页为“邱逢甲,福建彰化,清光绪15/3/96。”可知丘是中了三甲96名进士。笔者注)。引见,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到署未几,以百政紊乱,厌之。乃援例以亲老告归。”^{[1](23)}丘逢甲当时年仅二十六,可谓少年得意的青年才俊。其父丘龙章潜斋先生五十多岁,身强体健,继母杨氏更是富于春秋,怎么说也算不上“亲老”。深入探究之,丘逢甲辞官不做的原因也非“以百政紊乱,厌之”几言可以概括的。

丘瑞甲撰《先兄仓海行状》解释其兄不仕清廷的原因,“满清科举沿明旧制,当时种族思想未萌,凡

收稿日期:2012-10-30

作者简介:赫兰国(1970—),男,山东聊城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文学博士。

得科举者,虽异族衣冠,亦无人不尊荣歆羡。先兄以时势如此,不得不借此为说法之具,实非其本意也,故终身不仕满廷。归养之后,诸弟皆幼,家计未充,上体亲志成家,下教诸弟成学。其掌教全台各书院也,课文以外,兼讲内外史及劝人阅报。台人士之有种族思想及知民主政体之荣者,皆先兄之教也。”^{[2](417)}这段文字不无过誉之处,要说丘逢甲早在1889年就具备排满反清之念,确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甲午战争中丘首倡台湾自主时给清政府的电文里尚有“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藩”^{[3](752)}等语,试想,早此五年的丘逢甲又怎会因排满而弃官呢?不过丘逢甲一生中最后十几年的确也做了不少排满的事情,晚年他已经完全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了,那是后来的事。但《行状》有两点还是正确的,一即“其掌教全台各书院也,课文以外,兼讲内外史及劝人阅报”,客观上起到了使“台人士之有种族思想及知民主政体之荣”的作用;二乃“先兄以时势如此,不得不借此为说法之具,实非其本意也”。此两点亦最为可取。丘本欲教育兴国,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惟有取得一定的功名方能在教育方面有所发展。

说丘逢甲是因抱定教育救国的念头而弃官不做绝非空穴来风。丘自幼跟随其父丘龙章读书,稍长(13岁),“先生间佐龙章公课童”^{[1](8)},帮助父亲教育管理学生,可谓耳濡目染,从小即接触、熟悉并热爱上教育。

台湾建省较晚(1885年),却因此具备后发优势,加上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处在更便于接触吸纳西方(包括日本)先进文化思想及科学技术的位置。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洋务运动官员,其在任期间,“注意台湾防务和各项经济文化建设,有意兴办洋务;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台湾的煤矿、铁路、造船、电信以及机器制造等业相继出现,并有了一定规模。此外,还设立新式学堂、鼓励垦殖、整理财政等,使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比内地多数省更为迅速,较多地受到西方思潮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影响,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意识形态的统治,相对来说,则不及祖国内陆那样漫长和根深蒂固。”^{[4](28)}丘逢甲的求学阶段正处于此一时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亦形成于这一时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牡丹社,胁迫清政府签订《台事专约》;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燃及台湾,结果法国不胜而胜,清国不败而败,双方签订了《中法新约》。清廷的懦弱无能,列强的肆意侵略都深深地刺激了青年丘逢甲。“他痛恨列强的侵略,尤感国事之多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令他担忧,促他思索。从此,他更加留心中外事故和西方文化,注意涉猎西方著作的译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试图从中找到一条有助于民富国强的新路。”^{[4](33)}

李祖基在《论丘逢甲的生平思想与时代潮流》一文中有一段话分析得相当透彻,“当时台籍士子有一普遍现象,即中试后大多不愿为官,或短期在外为官后即返故里服务乡梓,如新竹地区的郑用锡兄弟、台北地区的黄镶云、陈维英、黄敬、台南地区的陈震曜、刘思勋等。这期间固然有不满于官场的黑暗腐败等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台湾刚由移民社会转型而来,地方事务百废待举,极需一个士绅阶层作为社会的领导,这些人参与乡梓建设,发展空间很大,同样可以满足其成就感。他们是转型期社会的受益者,又是转型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者,而丘逢甲无疑是这些人士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代表。”^{[5](87)}

1904年丘逢甲为好友温中和撰《温柳介先生诔》,其中有几句话可视为丘弃官不做的绝好注释:“夫中国自秦以后,益集权中央政府。主国是、持风会,惟一二亲贵强有力者任之,无论起布衣、徒步之不得遽与也,即循资干进积年劳至卿二,天下望之巍然,而察其身之兴国,多若渺不相涉。则固不如耆儒硕学之不仕不显,而归而讲学于郡邑者,犹得以其说陶铸当世人才,其所鼓舞而激动者,于人心风俗往往大受影响也。”^{[3](838)}正是看到为官对社会产生不了多少影响和很难有大的贡献,不如讲学郡邑,陶冶人才,“于人心风俗往往大受影响也”,这应当是丘逢甲辞官的原因。

和当时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他们都努力寻求着富民强国的道路。丘逢甲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内渡之前,他虽没有提出什么口号或主张,却是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思想的。“丘逢甲兴学育才的教育思想孕育于青少年时代。当时被称为‘东宁才子’的丘逢甲1889年殿试中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到署不久,即弃官归里从教,以新知识新思想课士,迈开了教育救国的第一步。”内渡后兴办各类各级新式学校,主持广东教育多年,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6](302)}“国何以强?其

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其学有用无用判之也。”^{[3](780)} 丘逢甲还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把妇女的觉醒和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1902年他为陈撷芬女士《女学报》题诗一首：“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因本文所引用丘逢甲的诗歌大多源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岭云海日楼诗钞》，引用颇多，如都出注则相当烦琐，故凡引自该集的诗歌，只在所引诗句后标明篇名。）1909年7月，广东谘议局成立，丘逢甲任副议长，其间他提出“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并力促其顺利通过。

丘逢甲不但主张教育救国，且其教育理念非常先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早在1890年，其时离科举之废除尚有十六年，丘“掌教全台各书院也，课文以外，兼讲内外史及劝人阅报”^{[2](417)}，“概括帖之无用，除课应试文艺外，兼讲中外史实，劝阅报章，以广见闻”^{[7](394)}。丘自己刚刚参加完进士考试，对科举之无补于国家社会有切身的体会，故有在其掌教的书院中推广新学之举。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丘逢甲教育救国、启蒙国人思想的认识尚不甚明确的话，那么内渡后他则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公本年（1897年）为潮州知府李士彬敦请主讲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被目为异端，遭当道忌。岁终，辞去。”^{[7](399)}“本年（1898年），公主讲潮阳县东山书院，仍不变其讲学立教之旨。公自内渡，亟思培本荣枝，效日维新立宪……”^{[7](400)}后来，丘觉旧式书院不利于新人才的培养，1900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是年（1901年），公已成立岭东同文学堂于汕头，为粤东民立学校之嚆矢。公自为监督……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有志者趋之若鹜。辛亥革命，岭东义士多孕育于是。”^{[7](402)}1904年在乡设自强社课指导族中向学子弟；在城倡办初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师资力量；在乡筹办员山、城东两家族学堂，皆名“创兆”。翌年，又派宗人子弟往福建的武平、上杭以及广东的平远、嘉应、兴宁等邑，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间不下十数”^{[7](404)}。1906年，“公所倡办之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毕业，改办县立中学堂。在邑为乡族提倡种植果木，经营商店，并革除奢侈祭祀等陋习。又于员山创兆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转养成闽赣地方小学教师人才”^{[7](404)}。自1906年起丘逢甲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1908年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1911年广东独立，任教育部长。

由此可见，丘逢甲一生始终未曾脱离过教育，其教育救国的主张和行为也颇有成效。乙未保台时，“将领多门下诸生”^{[3](745)}；岭东同文学堂“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爱国热血青年，这些青年和旧式书院培养出来的书呆子绝然不同，他们不仅具有更为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思想活跃、关心国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4](149)}。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辛亥革命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的姚雨平先生曾就读于该学堂。“岭东同文学堂出身的留日学生大多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刘伟焘等人还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重要干部，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4](15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丘逢甲弃官的根本原因是他青少年时代就奠定了教育救国的世界观。这是与当时中国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相统一的。至于很多人认为丘弃官乃洁身自好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满于清政府官场的黑暗，这是丘逢甲辞官的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原因所在。

二、丘逢甲抗日保台期间任职问题的考辨

丘逢甲虽然厌弃官场，但对国家却是热爱的，在民族危机来临的时候，他又总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站出来，积极主动地为了民族大义而斗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开战，1895年（乙未）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不仅向日本赔偿巨额军费，还要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于日本”。上属割让之地的中国居民，两年后“尚未迁徙者，均视为日本臣民”。同时规定：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8]

消息传到台湾，丘逢甲立即作出反应，通知手下各营义军“一律准备开仗”，并致书台湾巡抚唐景崧，希望唐能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以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榜样，挺身而出，卫国保台，建立万世不朽之功

业。此时,丘逢甲已有台湾自主之意,只是因全国上下抗日形势高涨,主战派主张毁约并与日再战之呼声此起彼伏,继而又又有三国干涉还辽之事,故丘逢甲一边积极准备与日开战,一边寄希望于“废约”。

在整个抗日保台过程中丘逢甲一直起着中坚力量或者说事实领导的作用。那么,在这期间,他都担任了什么职务呢?关于丘逢甲此间的任职情况历来说法不一,大致有如下六种情况:

第一种:内务卿。见于吴德功《让台记》。

第二种:副总统。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

第三种:大将军。最先见于丘瑞甲所写《先兄仓海行状》。

第四种:团练使。出自连横《台湾通史·丘逢甲传》。

第五种:副总统兼大将军。始见于江山渊之《丘逢甲传》。

第六种:义军统领。戚其章先生主此说,且撰写《丘逢甲在台湾任职考辩》一文,论述详尽,有理有据,本人亦同意戚先生这一观点,文在不录。

但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丘逢甲抗日保台期间还曾担任过“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一职。

正如戚先生所言,丘逢甲内渡十七年,写诗为文两千有余,从未提及任副总统一职。直到丘逢甲去世,丘复撰《仓海先生墓志铭》时始现此说:“建议立台湾民主国,奉台抚唐景崧为主。台民推唐为总统,君为副。”^{[2](430)}丘复从丘逢甲游多年,对于丘逢甲的家世、一生大略及其为人相当熟悉,故丘逢甲之父丘龙章去世时,也是由丘复撰写的墓志铭。正因为丘复跟随丘逢甲多年,关于甲午、乙未保台之事,丘逢甲一定曾告知于丘复,“旅鸿消息来今日,戎马纵横话昔年”(《果园见访潮州次前寄怀韵》),诗题中的果园即丘复。因而丘复方能够在该墓志铭中有此一笔,当时丘逢甲刚刚谢世,他生前也没必要捏造一条史实出来,丘复所记当属可信。至于丘生前为何只字未提担任副总统一职,详见下文。

第二个提到丘逢甲任副总统的是江山渊(江瓊),他撰写的《丘仓海传》中云:“副总统群以属仓海,仓海不获辞,乃为副总统兼大将军,大权仍景崧操之,于是乎台湾遂为自主国矣。”^{[7](377)}文末有丘逢甲之子丘琮的注释云:“江山渊先生名瓊,高州人。民国初,曾为国会议员。其本人或亲族必曾随宦或游历至台,故能详悉台事若目覩耳闻,非他传记所能及也。……原文载民国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民国四年是1915年,距丘逢甲去世仅三年,丘琮之推测亦颇为合理,文中记载也当属可信。

丘逢甲三子丘琮1947年3月2日以台湾光复祭告丘逢甲,其祭文有云:“……致祭于先考前台湾民主国副总统、全台各路以军大将军、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粤代表仓海先生丘公之坟……”^{[1](288)}丘逢甲去世时(1912)丘琮已经18岁了,从小至长,常伴其父左右聆其教诲。丘琮说他父亲曾担任副总统与其说是得知于丘复、江山渊的文字,倒不如说是他亲自从丘逢甲口中听来的。

以上三则材料,一为墓志铭,一为传记,一为亲子祭父之祭文,且其作者皆熟悉丘逢甲,丘复、丘琮又与丘逢甲有着亲密的关系,故他们所记应当属实。另外,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其中有云:“逊清光绪乙未,割台湾畀日本。君抗争不获,帅义军兹堡,又建议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位总统,君副之。”^{[9](84)}汪先生曾经与丘逢甲谋过面,他的记载当亦有所本。

戚其章先生在考辩丘逢甲未曾担任副总统一职时如此说:“其实‘台湾民主国’根本没设副总统一职。前引之胡传、黄家鼎诸人,对于‘台湾民主国’所设官职记载详明,唯无一言语及副总统,当非偶然。查民主总统唐景崧之上奏、致沿海各省大吏电及晓谕全台布告,亦皆只谓设总统一职。后来,丘逢甲在诗里多次写台湾事,其中提及在台所任职务不下十数处,唯独没有一处称其曾任副总统,更可为明证。”^{[5](174)}戚先生仅据胡、黄二人所记就否认丘曾担任副总统一职,依据不够充分。因为“台湾民主国”从建立到唐总统内逃,不过十二日,由台北发出的政令文告为数有限,且因战事纷乱,传达递送相当困难,错讹遗漏亦在情理之中。丘逢甲在《致菽园》一信中说:“承询台湾往事。保台之疏,唐公几百上,刘亦屡上,几于无策不筹,而外间知不十一,弟亦四疏与血书为五。于时,瞬息百变,当局数人外,同在斯土者,且莫知本末,更勿论外间传闻矣。嗣迫为自主,此犹夷然,明知末着,而势不能不拚而出此者。成败之论,今古同慨,弟亦当局之一人,何事喋喋?辱荷垂问,敢尽其愚。”^{[3](758)}台湾当时“瞬息百变,当局数人外,同在斯土者,且莫知本末”,“更勿论外间传闻”。丘所说都是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察。

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先有总统一职,后又设副总统由丘担任,因时间不在同时,故唐景崧电文未及之。查《台海思痛录》:“……又奏派在籍兵部(按当为工部)主事邱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勇统领。体制在诸将上,与抚军往来文牒悉用照会。营制与湘、淮诸军异,与土勇亦相径庭。”^{[10](30)} 邱逢甲的地位在诸将之上,故能有资格“率全台绅民上书”,能“与抚臣誓死守御”,也正是因为其显著的地位,才会有“副总统,群以属仓海”的事情发生。

丘逢甲内渡后为文作诗两千有余,的确从未谈及任副总统之职,“义军统帅”、“大将军”等倒是出现过不下十数次,这也是戚先生反驳丘曾为副总统的一条依据。其实,这更不足为凭。

丘逢甲内渡后的清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有维新立宪运动。清政府对“革命”“民主”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当时情形可能十分残酷,陈三立是近代一位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在光宣诗坛上颇有名气。然而,现在收入他集中的诗作均为1901年后的作品。他写于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均未收入集中。大约是政变发生后,为避祸而付之一炬。“逢人莫说华盛顿,厉禁方悬民自由。”(《有客自美洲归作仗剑东归图为题卷端》)台湾虽然是在被割让后宣布为“民主国”的,但在清廷看来依然是大逆不道的,故唐景崧内逃后请旨陛见,即被拒绝,“奉旨‘张之洞电奏已悉。唐景崧著即休致回籍。钦此。’”^{[11](428)} 后唐在广州郁郁而终。丘逢甲回到大陆后同样遭受冷遇和打击,处境十分困难。故而言谈十分谨慎,惟恐因言辞、文字而遭祸。正所谓“忌讳文章少,穷愁问讯疏”(《潮州东门城楼寄怀梁仲遂》)。那么他的诗文中只字未提曾担任“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一职就容易理解了。至于义军统领,此乃义军,朝野皆认可、赞赏之,更何况丘担任义军统领还是清政府批准的。

关于避而不谈任副总统一职和避而不谈倡建“台湾民主国”同理。丘逢甲诗文中直到1910前后才略略提及台湾建国之事,那也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业已高涨,言论亦较为自由之故。其故友、门生、子女敢于公开宣称丘曾任副总统也是在民国成立之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综合上面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丘逢甲甲午、乙未保台期间,先担任全台义军统领,招募义军抗日卫土,起到了中坚作用;首倡建国,被举为副总统,从而更全方位地领导了或者说实际上起到组织全台抗日的的作用。

三、丘逢甲在台湾的抗日活动及内渡日期的考辨

丘逢甲在甲午、乙未年间,敢于任事,组织义军,首倡建国,并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和“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亲率义军和官兵联合抗日。他在整个抗日保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中坚性的。而非如连横等人所指责的“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连横论曰:……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12](721)} 连横除了指责丘逢甲挟款内渡外,还指责他未能死义。关于挟款内渡,汤国云、黄杨有《丘逢甲“挟款以去”质疑》一文,另有张明正《丘逢甲进士内渡与烧红炮考》一文,两文皆有理有据,已经为丘逢甲洗却冤屈,兹不赘述。还有人这样批评道:“丘继续其口头抗日去了。”殊不知抗日的形式有多种,执刀杀敌固然是抗日行动,创作诗文鞭挞侵略者,悼怀牺牲的勇士,鼓舞斗志,激励人们不忘国耻,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更何况,丘逢甲是两种形式都有上佳的表现。

丘逢甲抗日活动的起点应当从甲午中秋前后筹办义军说起。1894年9月,丘主动向唐景崧请缨筹办义勇以补台湾官兵力量之不足。10月28日得唐允准,12月11日唐奏章云:“湘淮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查台湾近山土人,防番打牲,多习枪械,训练不难。臣于闻警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邱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5](123)} 甲午中秋前后即为丘逢甲抗日活动之开端。

逢甲三弟乙未中秋赋诗云:“万里秋光澈广寒,神仙洞府好盘桓。几人豪气倾杯乐,一曲高歌行路难。当日防秋真画饼,(客岁随家兄办全台义军,于中秋前后办起。)今宵觅句费登坛。故山同此团栾

月,独向红羊劫里看。”^{[2](4)} 丘逢甲《菊花诗》其一有句云:“去年菊花时,奔走为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鲲洋。”这两首诗都写于1895年内渡后,可作为丘于甲午中秋前后即募练义军、筹备抗日的确凿证据。戚其章先生把1895年3月底义军到防之日称为义军初建之日,“亦即乙未抗日保台运动的开始”^{[5](124)}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虽然“义军统领”之职务1895年方才任命,但全台义勇的招募、造册、编伍在乡、选拔营官皆是为防备日本攻打台湾而起。丘逢甲知清兵之不可恃,率先在自己家乡台中地区提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江山渊《丘仓海传》)^{[2](423)},准备用武装反抗的手段,抗击日本对台湾的入侵。因而,不探究丘抗日保台的开始日期则罢,如果需要界定一个时间,那么1894年9月(中秋前后)应当是丘逢甲抗日活动的开始。

丘逢甲抗日的起点确定了,是不是丘徒以口舌为功而未曾切实抗日呢?抑或战争刚刚开始他就随唐景崧先后内逃了呢?答案都是否定的。

甲午战起,清廷命“号为知兵”的唐景崧代替邵友濂署理台湾巡抚,又调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渡台协办防务。但唐曾和刘“共事于越南,意见不同,怨仇日深”(江山渊《丘仓海传》)^{[2](424)},故命刘守台南,自守台北。逢甲综观台湾全局,知台北为重,战略地位重要,而“景崧虽号知兵”而防寇御敌远不逮永福。为此,丘竭力调和二人的矛盾,唐始终不听,丘颇为不满更深为此担忧,发出“其殆天乎”的哀叹。为防台北有失,丘在中路严密布防,以为台北后援。后来,台北果真率先失守,台南势孤,永福不支,台湾终为日人占据。

丘逢甲1895年3月底亲率义军到防,竭尽职守,亲自勘察地形,悉心布防。设指挥部于南嵌元师庙,派兵分扎扼要之地:“令其兄先甲率信字军两营分防中港、后垄等地;命卫队营张景龄驻扎虎头山;派谢道隆率诚字正中营守御狮头山;令丘国霖率诚字正前营守卫头前庄、红土山一线;派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青年将领统率其他各营加强训练,提高义军战斗力。”^{[5](139)}

6月初,台北告急,景崧电谕逢甲驰援,丘闻令即行。行军至桃园时,得知唐已内逃,台北兵勇作乱。丘痛斥唐景崧曰:“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江山渊《丘仓海传》)^{[7](427)}丘立刻率义军入台北维持秩序,无奈府库军械皆入溃军之手,义军势单支持不住,遂败。6月7日,日军进入台北,丘孤身遁,“收拾散亡,义师复集”。12日,日军进犯大嵙崁,丘令义军“伏于途中而击之”,杀伤颇多。此后,丘逢甲又指挥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率义军沿途抵抗日军,先后与日军战于新竹、苗栗、大甲溪等地。在新竹阻抵月余,打破日军的进军计划,后来日本又增调军队才得以攻占新竹南下。7月25日,日军集中大批军队进攻新竹,义军不支,溃败。

翟本端撰《丘逢甲与义军保台抗日》一文,推断“7月26日,丘逢甲与谢道隆内渡”^{[5](152)}。徐博东、黄志萍二人合著的《丘逢甲传》也说:“其时已是7月末梢(阴历六月上旬),距唐景崧6月6日内渡已近两个月时间。”^{[4](93)}该《传》又云:“经过六天的海上颠簸,1895年8月初(清光绪廿一年乙未六月中旬),丘逢甲一行三、四十人平安抵达福建泉州。连续几个月的剧繁忧劳,本已使他身心憔悴,上岸后,丘逢甲触景生情,想到家国破碎、壮志未酬。劳顿之余,气急攻心,竟连日呕血数升,卧床不起……半个月后,丘逢甲病势转愈……遂离泉州,动身反粤,乘船经厦门转汕头。……旋即乘船离汕,溯韩江而上……达潮州……丘逢甲在潮州小住几日……9月中旬,秋意正浓,正值晚稻扬花的时节,丘逢甲旋即乘船离潮,动身反归镇平祖籍……9月下旬(阴历秋分前夕),终于回到了祖籍镇平印山村。”^{[4](99-101)}此说基本照搬郑喜夫所著《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有几处错误:一是海上航行的时间不是六天,而是一天一夜;二是抵达点不是泉州而是厦门(尚有疑问,待考,笔者注。);三是徐、黄二先生为使丘逢甲的行程与其诗歌相合而人为地安排时地了。

张明正《丘逢甲进士内渡与烧红炮考》一文云:“……次晨(6月5日晨)由张家指派长工护送到涂葛堀港搭船……于6月5日夜晚启帆,6日平安抵达厦门。”丘逢甲当时就是由张家的“源发”商号提供帆船,护送回大陆的。“源发”商号老板张凤鸣乃张明正的曾祖父,自家船只的起点、终点当不会记错,海峡不过一百三十公里水程,如果顺风顺水的话,根本用不了六天,所以张说比较可信。

但是,观丘逢甲的诗歌,颇觉诸人之说还可深究。丘逢甲内渡后第一首诗为《鮀江秋意》,诗曰:“海上瀛洲已怕谭,浩然离思满天南。西风一夜芦花雪,鮀浦秋痕上客衫。”鮀江即汕头。芦花已经雪白,秋

色已深,若依众人之说,岂有广东地界8月份已秋深之理。《舟入梅州境》有句云:“悽绝天涯雁叫群,秋江一棹入斜曛。”大雁已经飞到广东了,是深秋之证明也。如果依徐、黄二人之说,丘逢甲在泉州疗养半月方到汕头,其时间也不会超过公历9月初(农历7月中旬),其时节正是广东盛夏,又怎会有深秋之景之物呢?

考罗香林著《邱逢甲先生传》“时永福守台南……逢甲欲往依之,会道梗,不能行;而台北已陷诸已邑,闻台南义声,咸跃跃思奋,逢甲复与约,定期会师,图恢复,为日兵侦知,防范甚密,不得乘。日人复以台湾为主,为逢甲所倡,欲得之甘心,逢甲乃潜身深菁穷谷,至台南失守,始痛哭辞归,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也。”其注释云:“据百隐邱传,谓‘后永福无粮,不能持久,台南亦失守,邱氏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遂痛哭辞故国而行’,是逢甲虽所部早溃,而其人则至永福归国后始离台也。永福离台在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日,则逢甲当亦于是月内渡也。”^{[7](3-7)}如是说,则丘逢甲内渡时间为公历1895年10月末、11月初。其时正是广东的秋天,与丘逢甲诗歌所描写景致吻合。徐珂撰《清稗类钞》、辑《甲午战争轶闻》都有类似记载,江山渊《丘仓海传》亦主此说。

由于缺乏足够资料证明丘逢甲具体内渡的日期,故拈出此说存疑待考。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丘逢甲都与台湾相始终,1894年9月即开始募义勇积极抗日;1895年4月,清政府割弃台湾后,丘逢甲多方谋求保台不被分割出去,未果,不得已首倡自主以抗日;1895年6月、7月在台北官军溃败后,所率义军担负起与强大的日军作战的重任,阻敌于台中地区月余;义军大败后,各散部或转入深山与敌游击战,或奔赴台南与黑旗军联合继续打击日寇,直到最后。

丘逢甲内渡,许多人不理解他甚至误解他,认为他贪生怕死,善始而未善终,亦即未曾“死义”,此乃苛求也。丘逢甲以一文人,振臂一呼,力保危台,与敌周旋数月,兵竭而退,退而保有用之身以求恢复,其志甚大;并且丘不仅武可抗日,文亦可起到同样作用。内渡后他把满腔悲愤化作诗篇,为后人留下许多诗史般的作品,让我们得以了解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丘逢甲的一生可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熠熠生辉。甲午战争前的丘逢甲是个忧国忧民、淡泊仕途、鄙弃功名利禄积极寻求富民强国道路的知识分子;甲午中日战争起,他散家资筹建义军,首倡自主,临危受命担任义军统领和民主国副总统,与强敌浴血苦战;内渡后,投身教育,为国育才,同情维新派进而转变成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可谓与时俱进。丘逢甲终生追求祖国统一富强的言行和其部下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在台湾殉国的壮举同样值得赞扬,正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

参 考 文 献

- [1] 郑喜夫. 民国丘沧海先生逢甲年谱[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 [2] 丘逢甲. 岭云海日楼诗钞[Z]. 上海古籍社,1982.
- [3] 广东丘逢甲研究协会编. 丘逢甲集[Z]. 岳麓书社,2001.
- [4] 徐博东,黄志萍. 丘逢甲传[M]. 时事出版社,1987.
- [5] 吴宏聪,李鸿生主编. 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C].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 [6] 丘晨波主编. 丘逢甲文集[Z]. 花城出版社,1994.
- [7]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辑. 岭云海日楼诗钞[Z]. 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
- [8] 王成. 清季外交史料(卷109)[Z]. 中华书局,1978.
- [9] 汪辟疆. 汪辟疆说近代诗[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0] 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 近代史资料(总51号)[Z].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1] 戚其章主编. 中日战争(第三册)[M]. 中华书局,1991.
- [12] 连横. 台湾通史(卷三十六)[M]. 商务印书馆,1983.

Examination of Three Things about Qiu Fengjia

He Languo

(Railway Police College, Henan Zhengzhou 450053, China)

Abstract: Qiu's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ach stage is very brilliant. Befor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1895, Qiu was worrying about the fate of his country, looking down upon official title and wealth; he is active to find a way of making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During the war, he donates his property to found a just troops and he is the first one to advocate democracy.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just troop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fought against Japan. After returning to his hometown, he devo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He showed sympathy for reformers and then becam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His actions wer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Qiu Fengjia; Saving China by education; Taiwan democratic countries; defending Taiwan against Japan; back to mainland